



08

预防冲突：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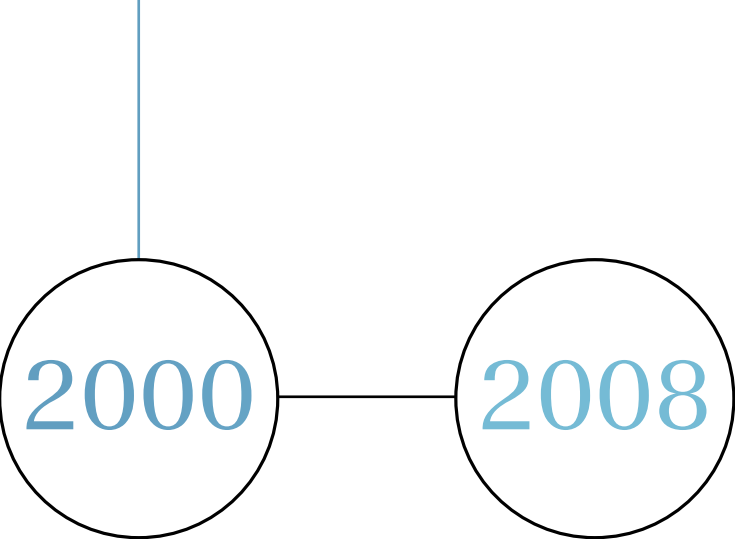
十 “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关乎预防战争，但并不关乎在战争中为妇女提供更多保护。”

本全球研究的亚太区民间社会磋商参与者

各项决议的重点内容

+ 第1325号决议

重申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在建设和平方面起重要作用，强调必须让妇女平等参加和全面参与维持和促进和平与安全的一切努力，而且有必要加强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相关决策中的作用



2000

2008

+ 第1820号决议

敦促秘书长及其特使邀请妇女参加关于预防和解决冲突、维护和平与安全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的讨论，并鼓励参加此种对话的所有各方为妇女在决策一级的平等、全面参与提供便利；敦促秘书长及其特使邀请妇女参加关于预防和解决冲突、维护和平与安全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的讨论，并鼓励参加此种对话的所有各方为妇女在决策一级的平等、全面参与提供便利

+ 第2106号决议

申明，性暴力，如果作为一种战争方法或策略，或作为针对平民发动的广泛或有计划攻击的一部分来使用或施行，可严重加剧武装冲突并延长其持续时间，阻碍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此强调，采取有效步骤防止和应对这类性暴力行为可大大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强调任何预防和保护对策都必须有妇女的参与



2013

+ 第2122号决议

请秘书长和秘书长派到联合国特派团的特使和特别代表，作为定期情况报告的一部分，向安理会通报邀请妇女参加关于预防 and 解决冲突、维护和平与安全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的讨论的最新进展，包括同包括妇女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进行协商

一直以来，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平活动家始终精诚团结，力图终止战争。她们始终如一地广泛呼吁和平承诺和解除武装，甚至在自己的国家深陷战争时也未曾停止。在2000年也同样如此2000年，当妇女要求安全理事会制定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时，她们要求安全理事会议程应包含预防战争这一重要内容，以及承认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在解决全球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复杂挑战方面的能力。

她们希望从根本上转变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她们的核心目标是，预防武装冲突和终止日益扩大的军事化，以免家庭、社区和国家处于更不安全而非更安全的境地。今天，这些担忧和恐惧依然存在。在本研究的磋商过程中，世界各地的妇女确信，联合国已将自己“铸剑为犁”的愿景抛之脑后。¹多年来，国际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和资源转移到通过军事化方法实现安全、解决争端以及为冲突中的平民提供仓促和临时性的保护。这并非15年前所设想的“冲突预防”。

2015年，联合国系统同时展开三大和平与安全审查并非巧合。为建立和维持和平而设立的机构和机制已黔驴技穷，以过去年代的多边逻辑方式运行，过度依赖危机爆发后的缓解工作，而非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可持续的长期方式。最近成立的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发现，预防工作“相对于武装冲突期间和之后部署的、资源更充沛的和平行动而言其资源仍然十分匮乏。”²主张以军事化预防冲突的观点低估了第1325号决议要让世界更平等、更公正和更和平的变革性愿景，也忽略了一种经证明可用来实现这一愿景的方法。

“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的通过确实是一个转折点，是一项非常值得庆祝的成就。然而，我们还必须用它来击垮被市场化和军事化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费莉西蒂·鲁比，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秘书长，第1325号决议通过时的发言³

无论根本原因是什么，付诸武装冲突都会对受到影响的社会产生灾难性的冲击。经济损失、对国家机构的长期影响和冲突常态化及其相关影响仅仅是冲突所酿的若干恶果。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和脆弱国家一直是千年发展目标成效最差的国家。⁴正如2015年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所述，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十个国家无一不是冲突中或冲突后国家。⁵战争、接踵而至的有组织的政治和刑事暴力，以及相伴随的腐败，阻碍了总体经济发展，其直接损失（如基础设施损坏）和间接损失（如旅游业低迷）极大地影响了国家预算和国内生产总值。2014年，暴力在全球造成的损

失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3.4%，相当于14.3万亿美元。⁶不仅如此，由于全球贫困女性化，冲突与发展之间的联系造成了严重的有性别偏向的影响。

本研究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不可通过军事手段提供保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国际社会一直行动迟缓，既未能采取有效的预警和预防措施，也未能消除根源（即使根源很明显），而太快以武装手段应对危机。国际社会需要转变态度，不再主要倚重军事手段，而是投资于和平预防冲突的战略。

两项同步进行的联合国和平与安全审查得出了相似的结果。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指出，“预防武装冲突也许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职责，而国际社会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尽职尽责。”⁷2015年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强调，用军事手段应对冲突虽然“对紧急的暴力局势有效，但往往只解决表面问题，而没有消除问题根源。”⁸该报告还指出，联合国对冲突预防和恢复这两方面的有限关注就像是一个“倒U型”，即“联合国极少有效关注预防，高度重视危机应对（尽管往往仍未满足需求），而又较少关注恢复和重建阶段。”⁹

这两份报告都为加强联合国通过中短期战略预防冲突的能力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其中包括：在联合国系统内加强对调解的关注、资源投入和协调；联合国提早参与应对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现威胁；以及召集关键利益攸关者关注早期预防冲突方面的优先事项。

虽然这些建议构成了以预防为优先事项的讨论的重要起点，但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附加

值在于其对冲突预防的结构性评估和应对——即主张：要实现可持续和平，所有行为体都须着手解决冲突和暴力的根源，共同改变目前全球政治经济优先为战争做准备、而非为和平做准备的情况，阻断暴力和不安全状态的循环持续（妇女和女童首当其冲），以及应对如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控制权等因素在制造不安全局势方面日益严峻的挑战。

预防冲突的方法

根据目标定位不同，预防冲突的方法一般分为两类：¹⁰

- （1）行动性方法，或短期实用战略；和
- （2）结构性方法，或长期预防。

这两类方法都将受益于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进一步整合。

行动性（中短期）方法：预防和防备潜在暴力

预防冲突的行动性或中短期方法包括采纳和执行实用的潜在冲突监测和防备战略，确保在暴力爆发之地迅速应对。行动性预防包括预警和应对、预防性外交、维持和平以及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等战略。虽然将性别平等作为一个分析类别纳入冲突调研、以及采用妇女领导或知情同意的预警和冲突解决战略已经被证明可以提高冲突预防措施的有效性，但这些做法至今仍很少被采纳。

聚焦

联合国的冲突预防工具

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在其报告中呼吁对和平行动工作的四个方面进行决定性的深远变革，这首先要求联合国重视预防冲突和调解。¹¹除了涉及预防和调解工作的维持和平和政治特派团，联合国还有许多工具也在发挥作用，其中包括秘书长斡旋、和平与发展顾问和“人权先行”倡议。

秘书长斡旋是通过预防性外交解决冲突的重要途径。它的使用在过去15年中得以加强和扩大，历任秘书长及其特使和秘书处高级官员对联合国议程所列的几乎每一个主要武装冲突进行了调解。¹²正如本报告第10章：主要行为体所述，联合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妇女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包括秘书长斡旋相关职务——目前担任秘书长斡旋相关职务的18人中只有4名女性。

联合国的**和平与发展顾问**¹³配合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国家工作队制定和实施冲突预防方案。他/她们。这些顾问有男有女。寻求以国家行为体向前推进预防和建设和平工作的能力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¹⁴和平与发展顾问还负责将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纳入其预防冲突工作。对这一点的接受程度似乎因人而异，但政治事务部一项内

部审查建议高层领导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和平与发展顾问认识到将性别平等主流化是其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¹⁵此外，一项独立的和平与发展顾问方案评估发现，担任和平与发展顾问一职的女性人数不足，34名和平与发展顾问中只有6名女性。¹⁶

秘书长于2013年底推出了**人权先行倡议**，旨在确保联合国系统按照宪章和联合国决议的规定，采取及早且有效的行动防止或应对大规模的侵犯人权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联合国在努力落实该倡议——包括动用高级别咨询小组——的过程中，必须确保将性别平等分析纳入行动的各个方面，并确保建议特别注意促进和保护妇女人权。同样重要的是从性别平等的角度认识被监测到的、触发联合国系统响应的侵犯人权行为。¹⁷

联合国今年开展的三项和平与安全审查全都强调，迫切需要加大对预防战略（包括监测和分析）的投资。然而，落实这些建议应考虑到，无论监测到哪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或者无论咨询谁来改进系统的设计、分析和应对，都将直接影响工作的力度和影响力。在这方面，妇女在冲突中的不同经历给了她们不同的信息来源，让她们能够识别预警趋势——这是加强冲突预防和缓解的利器。

**我们【……】呼吁安
全理事会和所有行为
体注重以性别敏感方
式解除武装和预防冲
突，包括预警。**

罗达三阪，散居海外南苏丹人协会创始人之一、妇女发展组织EVE成员，安全理事会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公开辩论，2014年

预警

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冲突分析能够发现其他方式无法发现的冲突驱动因素和触发因素，而妇女的参与是加强预警有效性的重要途径。妇女能够帮助识别可能引发国家层面紧张局势的基层、家庭及社区层面关系变化。如果没有妇女参与，可能就无法识别这些变化。例如，妇女和女童能够发现男子和男童时间分配模式的变化（如秘密训练），以及发现家庭和社区中心武器储藏处的变化。在科索沃和塞拉利昂的研究发现，那些局势下的妇女拥有关于武器聚累和谋划暴力袭击的宝贵信息，却没有办法报告或分享这些信息。¹⁸

妇女生活中持续不断的有性别偏向的暴力也意味着，当社会不安全状况日益严峻和普遍时，妇女可能是最先受到影响的群体。例如，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导致妇女行动自由受限制、公共场所爆发袭击事件的风险加大，以及妇女因各种威胁而无法或不愿意去农田和菜园。同样，家庭暴力现象日益严重以及妇女尤其可能受家庭内外性别暴力侵害，往往反映出整个社会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和军事化倾向。这些具体问题若被预防行动（包括预防冲突中的性暴力）的预警机制发现，可成为重要的指标和信息来源。促进妇女参与预警、制定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指标，并制定专门用于影响妇女的性别暴力的指标，这个三管齐下的方法可提高我们预防冲突工作的有效性。

消除将妇女和女童排除在预警之外的现象至关重要。

通过直接与妇女合作和提供利用其知识的途径，预防冲突的方法得到了改善。这包括确保在

预警系统的制定过程中与妇女进行磋商，以及确保为妇女提供向数据收集中心报告信息的专用渠道。如果在读写技能或信通技术方面有障碍，就应努力确保妇女接受培训或提供其他报告途径。妇女组织尤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她们对于不断变化的性别权力关系和妇女享有自由的具体变化往往有重要洞见，并且了解性别暴力发生率的变化以及男性在家庭内外的行为模式的变化。因此，她们应该担任相应的角色，使她们在现有机制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宝贵见解的影响力。

预警机制和指标必须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预警系统的有效性是建立在确保男女平等参与预警措施的构思、设计和落实之上。关键是制定和使用按性别分列的指标以及按性/性别分列的指标。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预警指标范例包括：

- 按性别分列的人口流动。
- 女性户主或男性户主的家庭增多。
- 安全部队骚扰、逮捕和审讯男性平民的情况增多。
- 性别角色模式的变化；例如，男性从事政治活动，女性则更多地担任家庭生产角色。
- 商品的囤积，地方市场上商品短缺。
- 社区层面对男子、妇女和儿童的武器训练。
- 吹捧男性军人的宣传、新闻报道和方案。
- 妇女对销售和贸易及公共社区讨论的参与受阻或削减。
- 男性召开有益于男性的会议次数增加。

- 对男子的随机任意拘留。

这些类型的指标可被纳入多个预警系统模型以及国家级防备和规划政策之中。2005年，妇发基金（联合国妇女署的前身）在所罗门群岛支助了“用有性别偏向的预警指标监测和平与冲突”项目的开发，该项目确定了若干指标，以反映男性和女性在未解决的土地争端上所受的长期影响，评估妇女在“无枪村”方案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监测反映妇女经历和担忧的媒体内容。¹⁹该模型采用与社区成员讨论的形式，分别询问男性和女性的看法，确保监督员既有男性又有女性。

在南苏丹，南苏丹特派团支持社区妇女和平对话论坛，该论坛让妇女参与识别预警信号，以解决社区冲突，并领导防止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运动。²⁰此外，维持和平工作团设立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通的热线电话，在高风险社区部署

了通讯设备，并在特派团的行动中心收集和分析信息。例如，琼莱州的冲突预警指标包括全部由男性组成团体的不同寻常行动、新娘聘礼上涨和中止妊娠事件增多等等。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召集非洲之角的七个国家（即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共同发展的区域组织——制定了冲突预警和反应机制。²¹冲突预警和反应机制在各种监测紧张势点的指标基础上接收和分享信息，这些指标大多可促进性别平等，并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预警。²²冲突预警和反应机制的预警报告强调了畜牧冲突及相关冲突对妇女和女童造成的影响；纳入了衡量妇女在建设和平或促进暴力行为方面所起作用的指标；向实地监督员传授了性别问题相关知识；并在实地调查中纳入了性别相关问题和指标。²³

聚焦

以社区为基础的预警方法

荷兰一个基金会“天主教救援与发展组织”制定了一套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式预警方法，取名为“当地妇女安全晴雨表”，此方法已在七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和领地得到实施。为创建晴雨表，天主教救援与发展组织与当地妇女一同明确她们对安全的定义，并确定用于衡量安全的指

标。²⁴妇女接受关于如何收集相关数据的培训，天主教救援与发展组织将收集到的数据汇集到数据库中并进行分析，并与地方、国家和国际决策者分享。该项目的初步结果表明，该晴雨表实现了决策者和当地妇女之间的信息互通，并使妇女能够就自己社区的日常和平与安全问题发表看法。²⁵

聚焦

监测有性别偏向的暴力：
联合国行动“冲突中性暴力的预警指标模型”

以专用系统监测有性别偏向的暴力不仅对预防冲突至关重要，对预防冲突中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也至关重要。2011年制定、供参与人道主义保护工作的行为体使用的联合国行动“冲突中性暴力的预警指标模型”正是监测工具的一个实例。²⁶该模型建立了一套明确的指标，用于监测潜在的、即将发生的或正在进行的性暴力行为。它使保护行为体能够进行充足的防备规划，并对冲突中性暴力的风险因素作出快速反应。

指标包括：

- **军事和安全因素：**奖励或训练攻击性、极度男性化行为的武装团体；在药物或酒精的影响下行动的战斗人员；以及靠近平民中心的军事基地或营地部署。
- **人道主义和社会因素：**妇女和女童行动模式的变化（例如，她们突然没去学校或市场，但并非出于学校或市场或季节方面的原因）；由于社区内没有男性或由于被丈夫或社区弃绝的妇女人数增加而导致女性户主家庭增多；因不安

全或紧急状况而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以及在武器携带者出现的地区，家庭或执法人员报告女童在上学或放学路上失踪。

- **政治和法律因素：**比如暴力的、违宪的权力更替；政治领导人纵容或鼓励强奸以及为性暴力辩解的言论；以及针对选举进程中女性候选人和选民的暴力行为（包括心理暴力、性暴力和身体暴力）。
- **经济因素：**武器价格下跌或供应量增加；通货膨胀和粮食无保障；以及关于妇女参与暗战经济（如贩运、卖淫）的报告增多。
- **媒体因素：**媒体镇压和限制言论自由的迹象增多；公开煽动性暴力，包括用过去的侵害社区/团体行为为将来的攻击行为辩护；
- **健康因素：**艾滋病/性病检测请求增多；寻求秘密堕胎的妇女增多；以及女性监狱服刑人数增加和关于妇女/女童遭受酷刑及其他形式的虐待的报告增多。

预警机制应特别监测性别暴力。监测暴力时应确保妇女和女童能够通过安全的渠道报告暴力事件，并且在报告之后能够获得后续应对服务。如前文所述，尤其是家庭暴力的日益增多，可能是各种暴力行为日益增多的一项指标，而且我们发现遭受家外攻击的风险和可能性加大也是早期冲突的指标。妇女和妇女组织将有可能拥有关于这些类型的违法行为日益增多的最准确信息，故而应让她们参与正规的预警机制。指标也应明确涵盖性别暴力问题，例如：

- 性别暴力：有关强奸和家庭暴力、贩运和绑架、有性别动机的杀害案件和男女失踪的报告增多。
- 对妇女的公开流动、着装、能力的管制加大、妇女的原教旨主义观点滋长。

在东帝汶，非政府组织BELUN自2009年以来已协调制定了一套国家预警和反应系统。²⁷该系统力图在社区监督员中保持性别平衡，收集按性别分列的关于监督员所处局势的信息和事件表，以及通过定期监测报告报告关于性别暴力的专项指标。

技术的使用

截至2011年，世界人口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网民，其中发展中国家网民占63%，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发达国家。²⁸全球网民的增加表明，这项极具潜力的技术必定能够广泛用于预防冲突工作。

已然很明显的是，正如新技术被用来发动战争那样，它们也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加

强人身安全、预防冲突和建立和平。例如，人们把无人机当作灾后人道主义应急手段，能在第一位人道主义急救者抵达灾区前，就安全地来到需要援助的灾民身边（并有可能用于冲突后应急）。在刚果（金），联刚稳定团使用了无人驾驶飞机追踪在攻击事件中被赶出家园的平民的迁移和行踪。²⁹稳定团还制定了一个方案为妇女提供手机和SIM卡，作为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预警系统的一部分，从而使受影响群体能够直接获取联合国提供的保护资源。³⁰在遥远的亚马逊河流域，圭亚那的瓦皮查纳土著社区与非政府组织“数字民主”合作创建了一套预警系统，用来监测发生在其土地上且威胁其环境安全的非法森林活动和金矿开采事件。³¹

脸书和推特等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为提高人们对暴力事件报道的认识、参与与全球妇女的对话以及传播对妇女在不同社会所起的不同作用的认识提供了渠道。在线平台正用于以众包方式收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成文信息，在某些情况下，还用于将有关暴力侵害或骚扰妇女行为的报道与处理问题的问责对应起来，比如叙利亚的“受困妇女计划”。³²卫星技术正使维持和平人员能够以更有针对性和更有效的方式对发生暴力事件或预期发生暴力事件的地点做针对性部署；这一技术还促进了为干预和起诉攻击社区行为而进行的证据收集，见第5章：转化司法。

 **尤其是家庭暴力的日益增多，可能是各种暴力行为日益增多的一项指标。**

专门用于加强冲突中妇女安全的新型移动技术正处于研发阶段。一些旨在帮助平民识别周边潜在危险和方便人们与附近盟友联系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也正在创建中。

妇女在获取技术方面遇到的障碍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进一步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预防冲突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妇女和女童对技术获取和控制的主要担忧。无论是从个人还是整体来看，妇女获取的技术以及获取方式都存在巨大差异，这往往归咎于她们在获取权力和资源（比如语言、教育和财富）方面遇到的既有障碍。³³在中低收入国家，女性拥有手机的几率比男性低21%。³⁴这一数字在非洲是23%，中东是24%，南亚是37%，³⁵而且城乡差距更大。

同样，尽管一项全球研究发现，由于拥有手机所带来的安全感，93%的妇女感觉更安全，85%的妇女感觉更独立，³⁶但在已经不安全的环境中，技术实际上可能使妇女的处境更危险。对于妇女人权维护者和记者尤其如此，因为她们的工作和个人生活可能会受到在线攻击和监视——对此因素的具体分析见第10章：主要行为体关于媒体的论述部分。

妇女和女童之所以依然未能获取新技术，除了经济障碍之外，其他原因包括：不知道信通技术能够如何影响其生活；缺乏时间；担心人身安

全；缺乏操作某项技术所需的技术知识；害怕受到嘲笑或社会谴责；无法获取某些类型的通讯技术；内容对她们无益或未满足她们的需求。所有这些障碍都必须加以解决，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在加强妇女和女童的人身安全和预防冲突方面的潜力。可持续发展目标5的指标5(b)将是这项工作的重要工具，因为它呼吁各国更多地使用能增强能力的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增强妇女权能。³⁷

社区调解、解决争端和缓解冲突机制

妇女状况室

一些国家的妇女民间社会组织已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通过提高认识和调解来预防和缓解选举中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许多非洲国家设立了妇女状况室，旨在通过促使利益攸关者开展建设性对话以及在选举前、选举中和选举后倡导和平，监测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防止或缓解选举相关暴力事件的爆发和升级。³⁸妇女状况室促进了从基层到国家各级行为体广泛参与这项工作，包括青少年、媒体、政治和政府领导人、私营部门官员以及宗教和传统领袖。妇女状况室是有组织的，而且考虑到了每个国家的局势特征，一般开展以下活动：预防性外交活动；平民教育；促进对话和倡导；以及在全国各地培训和部署监督选举的女性观察员。她们还力图提高人们对选举进程中暴力侵害和恐吓妇女行为的认识。

在选举开始前的一段时间，临时的实体“状况室”（一个中央协调中心）使主要的女性领导人和组织者、分析师及其他利益攸关者能够聚在一起协调战略和建议。她们还在这里对观察员和媒体报告的信息进行实时分析，并将相关信息传递给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者，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状况室还将各国国内及其邻国的杰出女性领导人汇聚一堂，彰显团结，并为跨区域协调和制

定战略提供机会。由于此战略涉及到在广大的受训观察员网络基础之上创建一套中央监测系统，该报告系统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需要经过更多分析才能确定。然而，在为确定妇女状况室对预防暴力工作的影响而做出的持续努力中，已然很明显的是，妇女状况室是提高认识和促进妇女之间及妇女与不同利益攸关者之间团结的重要平台，发出了维护和平和缓解政治暴力的明确讯息。

聚焦

妇女状况室：三个国家的经验

妇女状况室至今已用于肯尼亚（2013年）、利比里亚（2011年）、尼日利亚（2011年、2015年）、塞内加尔（2012年）和塞拉利昂（2012年）的选举。妇女状况室的运行方式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以下是一些实例：

肯尼亚

在2013年大选之前，妇女民间社会组织在内罗毕设立了妇女状况室，由来自坦桑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的一些知名妇女领导。³⁹经过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名观察员提供了报告。超过554起事件记录在册，包括关于对候选人和选民的威胁以及一般选民投诉的报告。随着案件得到处理，该机制促进了暴力事件的降级和缓解。

尼日利亚

2015年总统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期间，妇女状况室开通了一条免费热线，由40名训练有素的接线员应答广大民众的来电（尤其是关于妇女投票权限制的报告）。妇女状况室还培训了300多名女性监督员，并将她们部署到十个州。透过这一机制，政治、法律、媒体分析、警方和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代表得以交流信息和开展合作。⁴⁰

塞内加尔

妇女状况室于2012年总统选举期间由妇女参与和平选举平台设立。⁴¹超过60名妇女接受了培训，并作为监督员被部署到全国各地。⁴²在选举期间，监督员向状况室报告相关事件，状况室再将这些信息传递给警方、选举委员会和其他利益攸关者。

在基层建设和平

民间妇女社会组织 and 社区组织正在制定周密的建设和平战略，并在基层推进关键的预防冲突方法。这些努力在安全理事会决议（包括第2171(2014)号决议）⁴³和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中得到了认可。⁴⁴在利比里亚，已搭建了“议事棚”作为妇女聚在一起调解和解决社区争端（包括性别暴力事件）的安全场所。⁴⁵议事棚是处理社区中个人怨愤的一种传统方式，而利比里亚国家警察通过提供用来致电免费求助热线的手机，为议事棚更具包容性的全新职责提供了支助。此外，越来越多的男子和男童加入议事棚并致力于打击性别暴力，这一点可从“反强暴”足球俱乐部和男性领导人焦点小组的建立中看出。议事棚还是采掘业相关争端调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2年，议事棚妇女设置路障，抗议发生在巴波卢县的树木砍伐事件。⁴⁶妇女的这一行动使得林业部长被解雇，相关部门对采掘业特许权协议实施更严格的审查。

在哥伦比亚的某些地区，已形成“和平社区”，即宣告社区管辖区域和人口“中立”且不涉入任何武装冲突，并要求战斗人员不得将这些社区牵扯到暴力事件中。妇女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者。⁴⁷安蒂奥基亚东部有组织妇女协会直接与武装派别谈判，以期达成保护社区行动自由的临时人道主义协议。⁴⁸在苏丹，苏丹妇女权能运动制定了“基本和平议程”，以促进整个苏丹和南苏丹地区和平。⁴⁹该运动在这两个管辖区域全面展开，个中举措包括关于局势的妇女意见听证会、关于冲突解决和调解的培训，以及诸多更广泛的和平倡导战略等等。

在基层工作的强大妇女网络、妇女委员会和妇女团体的存在意味着，妇女作为社区调解员和社会动员者拥有重要经验，如有机会参与更正式的调解进程便能发挥重要作用。⁵⁰菲律宾总统和平进程顾问特莉西塔·德雷斯、肯尼亚的德克哈·易卜拉欣（已故）和自由亚齐运动叛乱团体前磋商者莎蒂亚·马哈班都是从社区组织者与地方和平缔造者做起，最终成为国际知名调解员的女性代表人物。外部行为体可通过为妇女参与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调解进程提供安全场地来支持这些妇女的工作。各国家、联合国和民间社会必须合作起来，共同建设和平基础，包括为来自不同团体的各年龄段妇女提供有建设性的互动机会，以消除自己社区内紧张形势和冲突的根源。⁵¹

结构性预防：消除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根源

预防武装冲突的结构性或较长期方法是消除战争和暴力的根源。这些方法旨在逐渐降低武装或政治暴力爆发的可能性，并促进以非暴力方式解决迫切需要和获得应有权利。它们包括努力解决结构性不平等和暴力问题、促进人权和人类安全，以及致力于非军事化、解除武装和削减军备开支。

2014年，全球军费开支（1.7万亿美元）⁵²比经合组织发援会会员国的发展援助拨款（约1350亿美元）高出将近十三倍。⁵³

2015年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针对冲突的驱动因素和结构性原因提出了重要洞见，分析了极端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薄弱的治理机构以及腐败

主题也就成为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中预防冲突方法的关键所在：解决地方及全球不平等问题；小武器、犯罪、暴力和性别平等问题之间的联系；以及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稀缺。

解决地方及全球不平等问题

从因社会服务获取渠道不平等而激化了了群体间敌意的科索沃，到政治排斥激化了抗议和暴力进而破坏社会稳定的也门，⁵⁹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的不平等显然加剧了群体怨愤，进而可能引发冲突。不平等严重的国家更可能被违宪的、或是强制的手段（包括有政治动机的暴力和恐怖活动）推翻。⁶⁰

虽然不平等一直是冲突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这已得到亚里士多德和联合国宪章等多方认可——但如今真该敲响警钟了。世界经济论坛将日益深化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列为2015年最受关注的一大趋势，⁶¹几乎每个国家最富成年人排名前10%的平均财富都是中产阶级财富的十倍以上。许多国家最富成年人排名前百分之一的平均财富是中产阶级财富的100倍以上，而这一数字在最不平等的国家甚至接近1000倍。⁶²

对于妇女来说，结构性不平等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贫困女性化的加剧。截至2007年，约20%的妇女的收入低于国际贫困标准1.25美元/天，40%低于2美元/天。⁶³女童和青年妇女同样有太多陷入贫困，超过四分之一的25岁以下女性的收入在国际贫困标准1.25美元/天之下，约有一半在2美元/天之下。⁶⁴这使女性在生活中更可能受到暴力和不安全事件的侵害，也更难缓解暴力侵害造成的影响。

+ 近期的大规模研究项目表明一个事实：妇女的安全程度是一国和平程度最可靠的指标之一。

性别平等问题和预防冲突

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规定，预防冲突这一核心工作应将预防武装冲突本身和预防先于政治暴力或因政治暴力导致的性别伤害这两项任务关联起来。⁶⁵

越来越多的循证研究显示，（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诉诸武力的可能性更小。妇女在国内受到不平等待遇——国内存在明显的不平等等级结构——与更严苛地对待其他国家、更可能以挑衅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政策也存在关联。⁶⁶同样，近期的大规模研究项目表明一个事实：妇女的安全程度是一国和平程度最可靠的指标之一。⁶⁷当人们对和平的认识不仅仅限于没有武装冲突时，全球性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无论是妇女法律地位不平等、性别选择性堕胎和杀婴，或蓄意针对妇女的性别伤害和谋杀——能够反映出冲突发生前、安全这一概念偏袒男性和当权者的趋势，因而成为了一项冲突预防的重要指标。因此，有效预防冲突必须首先了解冲突前影响妇女生活的广泛而深刻的不安全因素，以及冲突前结构性不平等可能助长暴力和不安全的各种方式。

军国主义和崇尚军事文化的男子气质引发并保持了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政治决策的常态化。除了传统武装冲突之外，军国主义还以其他形式出现。在本全球研究的磋商过程中，参与者指出军事化已通过各种方式渗入到她们的生活中：亚洲对采掘业的军事支持；拉丁美洲的“禁毒战争”；欧洲的军事化的反移民倡议；当然还有全球“反恐战争”。

在广泛的人类安全需求和措施方面，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增强权能、生殖健康和权利、健康和教育，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⁶⁸来自柬埔寨、哥斯达黎加和斯里兰卡的报告提供了削减安保和军事开支并有效转为社会方案投资的正面范例，⁶⁹但总体来说，对军事装备的投资远远超过了对和平与预防工作的投资。⁷⁰最重要的是，军国主义维护并延续结构性不平等，转而剥夺妇女和女童获取公共产品的权利，加剧排斥和边缘化，并诱发更广泛的不平等，进而加大暴力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妇女在武装冲突之中和之外都遭受有性别偏向的暴力，但这二者之间存在连续性和相关性。据世卫组织估计，全球35%的妇女都遭受过某种形式的性暴力或身体攻击。⁷¹这种暴力往往因冲突而加剧，导致冲突中出现各种性罪行和性别罪行，以及冲突后整个社会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发生率攀升。⁷²冲突中使用性暴力意味着在形式和方式上告别平时时期，因为这些暴行实际上可能被用作对付部分目标人群的一种策略和恐怖手段。然而，这种暴力的根源依然常见。正如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所言，“如果你在平时时期不保护妇女，那你

在冲突中也不会保护她们。显然，性暴力问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与社会及社区的结构相关。”预防冲突中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完全取决于能否在冲突前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尤其要预防冲突本身的爆发。

重要的是，各种局势下持续不断的性别暴力凸显了对个人领域与政治领域，以及冲突与和平的错误界定它表明有必要在预防冲突工作中将性别暴力作为关键因素予以特别注意和处理。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妇女报告说，家外暴力事件增多导致家庭暴力也随之增加。⁷³在埃塞俄比亚，据观察，家庭暴力在该国与厄立特里亚爆发冲突前日益增加。⁷⁴在南斯拉夫战争中，跨种族强奸妇女行为在冲突爆发之前日益猖獗，导致妇女在冲突爆发前六到八周就开始逃离。⁷⁵在卢旺达，胡图族极端主义媒体早在1990年就开始针对图西族妇女，通过淫秽物品等方式将她们描绘成间谍和胡图社会的一大威胁。⁷⁶以上每个实例作为预警指标皆完全被忽视了，其原因正是对个人与政治领域的既有错误界定。

我们不应将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冲突”与“和平”时期遭受持续不断的暴力侵害视为两件不同的事，而必须承认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共性。可以肯定的是，冲突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带有性别色彩，有性别偏向的普遍形势将加大政治暴力爆发的可能性。关于性别准则、性别关系和性别不平等对冲突爆发可能性的影响，预防战略必然需要对其深度有更强烈的认同和认识。

**“在这个国家，青年
妇女走在街上无不感
到害怕。”**

本全球研究的萨尔瓦多民间社会磋商参与者

武器、犯罪、暴力和性别之间的联系

小武器及其扩散是所谓的“和平社会”军事化的直接结果。无论是在从未经历过武装冲突的社会，还是在那些经历过阶段性或周期性冲突的社会，小武器供应都抑制了对预防武装冲突的努力，并促使社会暴力升级。这类武器的获取直接关系到并影响妇女在冲突中和冲突外遭受有性别偏向的暴力的形式和强度。如今，小武器的全面供应已显著扩大了这些武器的影响。2001年到

2011年间，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全球贸易额几乎翻了一番，从23.8亿美元增至46.3亿美元。⁷⁷

在冲突结束后，由于国家机构和法规处于新建阶段，而与冲突相关的武器仍广泛流通，获得小武器的便利性导致妇女更可能遭受暴力和不安全状况侵害。在许多冲突后社会中，各种方式、各种形式的暴力和暴力行为体仍显著持续存在于政治、社会和刑事等领域，导致妇女更可能在公共领域受到攻击，包括受到犯罪团伙和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攻击。这些攻击型犯罪行为是妇女和女童在冲突中和冲突后遭受的持续不断暴力的一部分。有罪不罚、暴力常态化和国家机构被削弱等现象猖獗，以及国家行为体与犯罪集团之间的正式关系，都促使犯罪活动增多，而获得小武器的便利性使这些犯罪获得更具毁灭性。⁷⁸在拉丁美洲，本全球研究的民间社会组织调查受访者称，有组织犯罪是该地区妇女、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最紧迫的新问题。⁷⁹

十 “预防冲突是【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要素【……】如不加强投资妇女人权、平等、教育和妇女领导的民间社会，我们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和平。”

布丽吉特·鲍利勃，中非共和国地方法官，非洲妇女团结会委员，以及中非共和国妇女律师协会创始成员，在安理会妇女、和平与安全公开辩论会上的发言，2014年

的确，在本全球研究在世界各地开展的磋商中，生活在因暴力犯罪而更不安全的局势中的妇女和女童讲述了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对于应对其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威胁和日益常态化的暴力有多么重要。她们要求全球和平与安全政策框架和举措不要受限于国家行为体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狭义政治定义，而应向更广泛的平民安全概念转变。近年来，在解决小武器扩散问题上的工作力度有所加大。例如，《武器贸易条约》（2012年）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武器的销售和使用，并减轻了对有性别偏向的暴力发生率的影响。该《条约》第7(4)条规定，缔约国有义务评估武器“被用于实施或协助实施重大性别暴力或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侵害行为”的风险。这一规定承认了性别暴力与武器贸易之间的联系，并将极有可

聚焦

中美洲的女童和犯罪团伙

“这一地区从来没有和平。拉美人民遭受过种族灭绝、猖獗犯罪和长期暴力【……】。拉丁美洲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最暴力的地区之一。”

本全球研究的拉丁美洲地区民间社会磋商报告

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这三个相邻国家的女性被杀率居全球之首，⁸¹例证了第1325号决议在非冲突/冲突后不安全环境中的重要性。在这三个国家中，妇女和女童遭受着发生率惊人的致命和非致命暴力，这主要是因为有组织犯罪集团和犯罪团伙争夺毒品市场控制权而造成的。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遭受不安全状况和暴力侵害的程度无异于生活在（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妇女和女童。

青少年犯罪团伙已成为近期的一个新现象，主要受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中美洲武装冲突的根源）驱动。在本全球研究在萨尔瓦多开展的磋商中，参与者着重指出犯罪团伙如何专门针对

青年妇女，严重剥削她们追求自由和身心健全的权利。

关于中美洲青少年犯罪团伙的研究已开始揭示出妇女和女童在犯罪团伙中担任的复杂角色，包括她们成为犯罪团伙的成员和合作者，而不仅仅是受害者；同时也注意到她们作为这些团伙的新成员和成员所忍受的惨无人道的虐待。⁸²女性参与犯罪团伙加强了冲突、犯罪活动、针对性别的经济和社会排斥与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之间的联系。要使第1325号决议适用于有组织犯罪和帮派暴力等各种状况，就必须了解这些联系。⁸³

尽管将第1325号决议应用于这些状况面临着陌生的挑战，但也有一些明显的机会。例如，各国政府可以与国内和国际妇女组织合作，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和联合国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公约，共同制定和修订关于落实第1325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包括其关于人口贩运和走私的附加议定书。⁸⁴

能引发性别暴力的武器转让列为非法行为。此外，旨在促进和平、包容的社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6，将非法资金和武器流动显著减少设为一项指标，并要求打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犯罪。⁸⁰这两项全球政策承诺结合起来，能够为消除武器扩散这一冲突根源及妇女和女童不安全常见原因提供框架。

具体的国家级应对措施也已转向解决小武器和轻武器流动问题。为应对菲律宾全国枪支暴力猖獗问题，妇女民间社会组织游说当权者通过《武器贸易条约》，并将小武器控制纳入菲律宾关于落实第1325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该计划中有一项行动是建立和实施管控小武器所有权的法律，并将小武器转让和使用法规通过情况设为一项指标。⁸⁵

了解同为冲突原因的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稀缺

随着各国社会遭遇不断变化的气温、反复出现的干旱、不稳定的降雨量、极端天气事件和更多不安全状况，过去15年的一大显著转变在于气候变化日益明显的影响。气候相关压力因素——

+ 在拉丁美洲，本全球研究的民间社会组织调查受访者称，有组织犯罪是该地区妇女、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最紧迫的新现问题。

+ “气候变化并非不带性别色彩，【……】妇女已经承担着过重的气候变化负担，随着气候变化引发的冲突愈发威胁到她们的生命、生计、和平与安全，她们的负担只会更重。”

妇女、法律和发展亚太论坛提交至本全球研究的报告⁸⁸

包括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都已增加的自然灾害，以及自然资源稀缺——已成为加剧当前社会紧张局势、推动冲突和加深既有不平等（包括性别不平等）的罪魁祸首。为有效预防冲突，我们需要承认并深入了解气候变化这一加剧当前脆弱局势和引发社会动荡与暴力冲突的威胁的因素。⁸⁶从气候变化压力因素与冲突中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达尔富尔旱灾，⁸⁷到因旱灾加剧资源管理不善而带来长期恶果的叙利亚，⁸⁹再到因整个群岛消失而迫使社区搬迁进而导致地方及区域关系紧张的太平洋，⁹⁰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

妇女和女童对气候变化与和平及安全之间的联系有着直接而深刻的体会。⁹¹例如，由于妇女往往是其家庭粮食、水和能源的提供者——这是许多社会基于她们的性别做出的规定——她们很可能因气候变化而在获取资源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对于进行这些日常作业时更有可能面临不安全和暴力问题的受冲突影响地区妇女，气候变化成为一大毁灭性负担。⁹²气候变化还日益影响移民和流离失所，再加上土地分配不公平、土地权无保障和基础设施不足等因素造成的影响，迫使民众在城区或跨越国界另谋生计，导致地方、区域及国际关系日益紧张。⁹³与所有流离失所者一样，因气候变化和资源稀缺而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易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侵害及其他人权侵犯。相关论述详见第4章：保护权利。

尽管妇女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稀缺方面有直接体验，但在脆弱环境和受冲突影响环境中，她们参与自然资源管理决策的代表人数严重不足。例如，无法获得水是加沙西岸地区的一大安全和政治问题。⁹⁴作为家庭用水管理者，巴勒斯坦妇女制定各种对策以循环利用废水、监测质量和防止浪费。尽管她们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但在直接与以色列国防部及保护水资源的士兵进行谈判的巴勒斯坦水务局中，她们参与决策的代表人数仍然不足。同样，妇女还必须参与关于气候变化的国家、区域和国际谈判，并参与气候变化政策与方案的设计和落实。

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自然环境是许多武装冲突的起因之一，而且环境恶化对性别平等问题有

“最边缘化的问题需要放到讨论桌上来。否则，我们在基层将永远找不到解决办法。气候变化是生存问题，而不是谈判的问题。我们需要确保青少年——后代人——参与解决这一问题。”

西尔维亚·阿图贡察·卡佩拉，乌干达卡拉莫贾米里亚姆河口民间社会网络负责人⁹⁵

具体影响，预防冲突工作必须也必然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在针对气候相关资源稀缺和冲突的预警系统中，以及在制定可持续的冲突应对措施时，妇女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稀缺的了解能够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妇女、和平与安全
议程的变革潜力尚未
完全发挥出来，这与
太少注重预防和社会
长期结构性变革，而
太过注重非常短期的
具体结果也有
关系。”

本全球研究的民间社会调查瑞典受访者，目前在西非和中非、哥伦比亚和缅甸的冲突地区工作

建议

2015年之后的进展展望：行动建议

应对不平等、武器扩散、有组织犯罪和军事化
会员国应：

- ✓ 作为缔约国落实《武器贸易条约》中性别暴力相关条款（第7条第4款）的一项义务，要求武器生产公司监测和报告各自武器在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中的使用情况。
- ✓ 达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第5项关于性别平等的目标、第10项关于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减少不平等现象的目标，以及第16项关于和平、包容社会的目标——以确保妇女和女童平等受益于这些成就，并优先安排她们磋商和参与可持续发展议程有关方案的落实、监督与问责。
- ✓ 作为战略，采纳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做法，包括与民间社会进行磋商，以处理、突出和缓解军事化的国家预算以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妇女权利的破坏性影响。

各会员国、联合国及民间社会应：

- ✓ 提供财务、技术和政治支持，鼓励面向男子、妇女、男童和女童提供教育和领导力培训，巩固和支持男性气质的非暴力、非军事化表现形式。

- ✓ 制定教育战略，培育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家庭和公共场所冲突的文化。

民间社会应：

- ✓ 制定具有性别视角的基准工具，监督武器制造企业针对武器使用责任所采取的措施。

预警

会员国、联合国、区域和国际组织应：

- ✓ 在所有预警流程、预防冲突和早期反应努力中纳入妇女参与、促进性别平等相关指标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相关指标（包括冲突中的性暴力），并与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官方反应渠道连通。
- ✓ 支持就性别不平等的代价、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程度以及暴力冲突的可能性，收集数据和提高认识。

技术

联合国、会员国和民间社会应：

- ✓ 与私营部门合作开发和使用新技术，以增加女性的人身安全，并加强冲突预防。

- ✓ 支持收集有关性别数字鸿沟的数据，以及限制和促进妇女和女童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因素，特别是在受冲突影响和脆弱环境中。

预防选举暴力、解决争端和调解

联合国应：

- ✓ 全面落实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有关调解的诸项建议，确保在受冲突影响地区与民间社会以及妇女和女童进行磋商。
- ✓ 制定新的战略，将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更系统地纳入更广泛的预防性外交工作中，包括预警机制、内部调解以及建设和平基础设施。

会员国、联合国和民间社会应：

- ✓ 通过资金、技术和政治支助等方式相互协作，强化妇女民间社会的能力，在国家和社区牵头的选举监督和选举暴力预防、争端解决和调解倡议中进行组织和发挥作用。

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稀缺

联合国、会员国和民间社会应：

- ✓ 在设计、落实和监测气候变化及自然资源相关战略方面，与受影响的妇女和女童合作，充分利用她们对当地的了解以及用于分享信息的社区网络。

会员国应：

- ✓ 与民间社会合作制定或修订关于落实第1325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以消除与气候相关的资源短缺和自然灾害对策在加剧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并提供具有包容性的方法来解决与气候和资源有关的不安全问题。
- ✓ 制定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自然资源管理政策。

参考资料

1. “让我们铸剑为犁”（叶夫根尼·武切蒂奇，1959年）雕像位于联合国总部入门外，让人们想起圣经经文：“他们应铸剑为犁，铸矛为镰：国家不应举刀相向，也不应再习战事”（以赛亚书，2:4）。
2. “Uniting Our Strengths for Peace - Politics, Partnership and People”，联合国文件文号：A/70/95-S/2015/446（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2015年6月16日），第62款。
3. Felicity Ruby著，“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25: A Tool for Conflict Prevention?”，摘自重新思考维持和平，性别平等和集体安全，2014年，182。
4. “Fragile and Conflict-Affected States: Signs of Progress to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世界银行，2013年5月2日，<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3/05/02/fragile-and-conflict-affected-states-signs-of-progress-to-the-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s>。
5.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ing Peace”，联合国文件文号：A/69/968-S/2015/490（2015年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专家咨询小组，2015年6月29日），第24款；“State of the World's Mothers 2014年: Saving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Humanitarian Crises”（拯救儿童联合会，2014年）。
6. “Global Peace Index 2015: Measuring Peace, Its Causes and Its Economic Value”（经济学与和平研究院，2015年），3。
7.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Independent Panel on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2015)”，ix。
8. “2015年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专家咨询小组报告（2015年）”，第121款。
9. 同上，第68款。
10. 预防致命冲突（卡内基预防致命冲突问题委员会，1998年）。联合国秘书长关于预防冲突的报告也主要摘自此框架。例如参见“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revention of Armed Conflict”，联合国文件文号：A/55/985-S/2001/574（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001年6月7日）。
11.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Independent Panel on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2015)”，ix。
12. 同上，第67款。
13. 和平与发展顾问属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治部建设国家冲突预防能力联合方案。
14. Sara Batmanglich著，“Independent Review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dvisors and the Joint UNDP/DPA Programme on Building National Capacities for Conflict Prevention”，2014年11月。
15. “Taking Stock, Looking Forward: Implementation of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25 (2000)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Work of the U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ffairs (2010-2014)”（联合国政治事务部，2015年3月），6。
16. 对这个具体方案的内部审议在和平与发展顾问工作中的性别平等部分显然未予触碰，虽然其报告了和平与发展顾问中的性别平衡情况，但是其指出，在强父权社会中，方案不应安排和平与发展顾问，以免在接触政府官员时会面临“额外阻碍”。参见 Batmanglich 著，“Independent Review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dvisors and the Joint UNDP/DPA Programme on Building National Capacities for Conflict Prevention”，第34款。
17. 联合国妇女署参与人权先行高级顾问小组或能加强这些工作。
18. Hannah Wright和Minna Lyytikainen著，“Gender and Conflict Early Warning: Results of a Literature Review on Integrating Gender Perspectives into Conflict Early Warning Systems”，简报（加强世界安全组织，2014年5月），3。
19. “Engendering Conflict Early Warning: Lessons from UNIFEM's Solomon Islands Gendered Conflict Early Warning Project”（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2006年1月）。
20. Pablo Castillo Diaz和Sunita Caminha著，“Gender-Responsive Early Warning: Overview and How-to Guide”，摘自联合国妇女署妇女、和平与安全资料手册（联合国妇女署，2012年），9。
21. Sebastien Babaud和James Ndung'u著，“Early Warning and Conflict Prevention by the EU: Learning Lessons from the 2008 Post-Election Violence in Kenya”（加强世界安全组织，和平建设倡议 - 从预警分析到行动，2012年3月），23。
22. “Gender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s: An Introduction”（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欧安组织民主体制和人权事务处，2009年），8。
23. Castillo Diaz和Caminha著，“Gender-Responsive Early Warning: Overview and How-to Guide”，10。
24. “Women's Peace and Security Barometer: Measuring Daily Security for Effective Peace Building”（天主教救援与发展组织，2014年3月）。
25. Karen McMinn著，“Candid Voices from the Field: Obstacles to Delivering Transformative Change within the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Agenda: Initial Research Findings for the Global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SCR 1325”（天主教救援与发展组织，防止武装冲突全球伙伴关系组织，以及妇女和平缔造者计划署，2015年6月）。
26. “Matrix: Early-Warning Indicators of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2012年9月）。
27. Castillo Diaz和Caminha著，“Gender-Responsive Early Warning: Overview and How-to Guide”，9。
28. “New Technology and the Prevention of Violence and Conflict”（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美国国际开发署，国际和平研究所，2013年4月），1。

29. “Utilizing Modern Technology i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o Improve Security for Women and Girls: Summary Document and Analysis”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乔治顿大学妇女、和平与安全研究所, 联合国妇女署, 2014年11月24日), <http://wps.unwomen.org/en/highlights/uae-panel-discussion-utilizing-modern-technology-in-peacekeeping-operations-to-improve-security>.
30. Wright和Lyytikainen著, “Gender and Conflict Early Warning: Results of a Literature Review on Integrating Gender Perspectives into Conflict Early Warning Systems”, 3。
31. “Forest Change Monitoring in Guyana”, 数字民主, 访问日期: 2015年7月8日, <http://www.digital-democracy.org/ourwork/guyana/>.
32. “Women Under Siege Project”, 访问日期: 2015年9月14日, <http://www.womenundersiegeproject.org/>.
33.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ajudicial, Summary or Arbitrary Executions, Christof Heyns: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to Secure the Right to Life”, 联合国文件文号: A/HRC/29/37 (联合国大会, 2015年4月24日), 第41款; A. Trevor Thrall, Dominik Stecula和Diana Sweet著, “May We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Human-Rights NGOs and the Problem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国际新闻/政府期刊第19卷, 第2期 (2014年4月1日): 135-59。
34. “Women & Mobile: A Global Opportunity: A Study on the Mobile Phone Gender Gap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全球移动通信协会、凯列布莱尔妇女基金会, Vital Wave 咨询公司, 2014年), 6。
35. 同上。
36. 同上, 21。
37.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年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5年8月1日, 第5b款。
- 例如参见 “Women’s Situation Room”, 联合国妇女署中西非代表处, 访问日期: 2015年7月8日, <http://www.unwomenwestandcentralafrica.com/womens-situation-room.html>; Udo Jude Ilo著, “Making Elections Count: A Guide to Setting Up a Civil Society Election Situation Room” (西非开放社会基金会, 2012年4月); “Nigeria Launches Its Women’s Situation Room”, 联合国妇女署中西非代表处, 2015年3月26日, <http://www.unwomenwestandcentralafrica.com/1/post/2015/03/nigeria-launches-its-womens-situation-room.html>; “Women’s Situation Room: A Unique Type of Response Mechanism in Elections”, 联合国肯尼亚通讯, 2013年3月。
38. “Women’s Situation Room: A Unique Type of Response Mechanism in Elections.”
39. “Nigeria Launches Its Women’s Situation Room”; “The Women’s Situation Room - Nigeria” (联合国妇女署尼日利亚代表处, 2015年4月29日)。
40. “Les Bonnes Pratiques de La Plateforme de Ville Des Femmes Pour Des Elections Apaisées Au Sénégal”, 非洲妇女团结会。
41. “Women’s Situation Room”, 联合国妇女署中西非代表处, 访问日期: 2015年7月8日, <http://www.unwomenwestandcentralafrica.com/womens-situationroom.html>
42. “第2171 (2014) 号决议”, 联合国文件文号: S/RES/217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14年8月21日), 第18款至第19款。
43. “Report of the Advisory Group of Experts for the 2015年 Review of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building Architecture (2015)”, 第46款。
44. “From Conflict Resolution to Prevention: Connecting Peace Huts to the Police in Liberia”, 联合国妇女署, 2012年9月19日, <http://www.unwomen.org/en/news/stories/2012/9/from-conflict-resolution-to-prevention-connecting-peace-huts-to-the-police-in-liberia>.
45. “Liberia’s Failed Logging Promises”, BBC新闻, 2012年9月4日,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19469570>.
46. “Peace Community: Armed Conflict Resistance”, 国际和平团 - 哥伦比亚, 访问日期: 2015年9月15日, <http://pbicolombia.org/accompanied-organizations-2/peace-community/>.
47. Camille Pampell Conaway 和 Anjalina Sen 著, “Beyond Conflict Prevention: How Women Prevent Violence and Build Sustainable Peace” (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 2005年), 32-33。
48. Zaynab El Sawi 著, “Women Building Peace: The Sudanese Women Empowerment for Peace in Sudan” (促进妇女发展权协会, 2011年)。
49. “Supporting Insider Mediation: Strengthening Resilience to Conflict and Turbulence”, 指导说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署), 2014年), 37。
50. “Infrastructure for Peace”, 问题简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署), 2013年2月)。
51. Sam Perlo-Freeman 等著,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4”, 和研所情况报道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15年4月), 1。
52. “Development Aid Stable in 2014 but Flows to Poorest Countries Still Falling”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 发展援助委员会, 2015年4月8日)。
53. “Report of the Advisory Group of Experts for the 2015年 Review of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building Architecture (2015)”, 第11至12款。
54. 同上, 第15款。
55. 同上, 第17款。

56. Hannah Wright和Sanne Tielemans著, “Gender, Violence and Peace: A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加强世界安全组织, 2014年2月。
57. 数据来源: 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milex_database。
58. Henk-Jan Brinkman, Larry Attree和Saša Hezir 著, “Addressing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s Drivers of Conflict i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建设和平支助厅, 加强世界安全组织, 2013年2月), 1。
59. Isabel Ortiz和Matthew Cummins著, “Global Inequality: Beyond the Bottom Billion: A Rapid Review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141 Countries” (儿基会, 2011年4月), 35。
60. “Outlook on the Global Agenda 2015” (世界经济论坛, 2014年11月)。
61.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4” (瑞士信贷研究所, 2014年10月), 28。
62. Ortiz和Cummins著, “Global Inequality: Beyond the Bottom Billion: A Rapid Review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141 Countries”, 22–23。
63. 与全球水平相比: 22%的全球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 同时40%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同上, 20。
64. 在其第30号一般建议中,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出了一种促进性别平等的冲突预防方法。该方法要求将预防武装和政治暴力爆发与升级的工作与对小武器扩展、军国主义和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侵害的预防结合起来。“关于妇女在预防冲突、冲突及冲突后局势中的作用的第30号一般性建议”, 联合国文件文号: CEDAW/C/GC/30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2013年10月18日), 第29款。
65. Mary Caprioli著, “Gendered Conflict”, 和平研究期刊第37卷, 第1期 (2000年1月1日): 51–68。
66. Valerie Hudson著, “Summary of Research Findings: 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Insecurity and State Insecurity”, 2015年3月。
67. “You Get What You Pay For” (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 2014年)。
68. Ban Ki-moon 著, “Secretary-General’s Remarks at UN Women - World Bank Event on Financing for Gender Equality”, 2015年7月14日, <http://www.un.org/sg/statements/index.asp?nid=8829>。
69. Maria Butler, Abigail Ruane和Madhuri Sastry著, “The Pieces of Peace: Realizing Peace Through Gendered Conflict Prevention”, 全球研究报告提交材料 (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 2015年), 3。
70. “Global and Regional Estimate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revalence and Health Effects I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Non-Partner Sexual Violence” (世界卫生组织, 伦敦卫生和热带医药学院, 南非医学研究理事会, 2013年), 2。
71. Rashida Manjoo和Calleigh McRaith著,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Justice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Areas”, 康奈尔大学国际法杂志第44期 (2011年): 11。
72. “Conflict and Sexual and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Helpdesk 研究报告 (治理和社会发展资源中心, 2009年5月), 3。
73. Castillo Diaz和Caminha著, “Gender-Responsive Early Warning: Overview and How-to Guide”, 5。
74. 同上。
75. 同上。
76. “Small Arms Survey 2014: Women and Guns: Highlights” (小武器调查, 2014年), 12。2011年, 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最大出口国包括美国、意大利、德国、巴西、奥地利、瑞士、以色列、俄罗斯、韩国、比利时、中国、土耳其、西班牙和捷克共和国。
77. Isabel Aguilar Umaña和Jeanne Rikkers著, “Violent Women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Gender Relations in the Maras and Other Street Gangs of Central America’s Northern Triangle Region” (国际建设和平联盟, 和平建设倡议 - 从预警分析到行动, 2012年4月); Jovana Carapic著, “Organized Crime, Gangs, and Female Involvement”, 背景文件 (小武器调查, 2015年5月); Mihaela Racovita 和Jovana Carapic著, “Girls, Gangs and Firearms Trafficking in Central America” (小武器调查, 2015年3月20日)。
78. “Global Report: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CSO) Survey for the Global Study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CSO Perspectives on UNSCR 1325 Implementation 15 Years after Adoption” (女性和平建设者全球网络、天主教救援与发展组织、非政府组织妇女、和平与安全工作组、国际民间社会行动网络, 2015年7月)。
79.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第16.4款。
80. “When the Victim Is a Woman”, 摘自2015年全球武装暴力负担: 每具尸体都很重要, 全球研究报告提交材料 (小武器调查, 2015年), 120。
81. “【虽】然加入团伙会带来某种形式的保护, 也会让女性面临其他危害。女性参与团伙使她们易成为【亲密伴侣间暴力】和性暴力的受害者; 这种暴力形式由团伙的超强男性规范形成, 同时常常用于使这种规范合理化”。参见Racovita和Carapic著, “Girls, Gangs and Firearms Trafficking in Central America”, 图3。
82. Carapic著, “Organized Crime, Gangs, and Female Involvement”。
83. 同上。
84. Megan Bastick和Kristen Valasek著, “Converging Agendas: Women, Peace, Security and Small Arms”, 摘自2014年小武器调查: 妇女与枪支, 全球研究报告提交材料 (小武器调查, 2014年), 51。
85. Lukas Ruttinger 等著, “A New Climate for Peace: Taking Action on Climate and Fragility Risks: An Independent Report Commissioned by the G7 Members” (阿德菲研究所, 国际警觉组织,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欧盟安全研究所, 2015年), vii。
86. Katie Peters和Janani Vivekananda著, “Conflict,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Topic Guide (国际警觉组织, 2014年11月), vii。

87. 亚太妇女、法律和发展论坛著, “Climate Change Natural Disasters Affecting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全球研究报告提交材料(2015年3月13日), 3。
88. “The Arab Spring and Climate Change”, 气候与安全相关性(美国进步中心, 史汀生研究中心, 气候和安全中心, 2013年2月)。
89. 亚太妇女、法律和发展论坛著, “Climate Change Natural Disasters Affecting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9。
90.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Summary: Summary Document and Analysis”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乔治顿大学妇女、和平与安全研究所, 联合国妇女署, 2015年1月15日), <http://wps.unwomen.org/en/highlights/uae-panel-discussion-women-peace-and-security-in-the-context-of-climate-change>.
91. “Women and Natural Resources: Unlocking the Peacebuilding Potential”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环境署), 联合国妇女署, 联合国建设和平支助厅(PBSO),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2013年)。
92. Ruttinger 等著, “A New Climate for Peace: Taking Action on Climate and Fragility Risks: An Independent Report Commissioned by the G7 Members”, 26。
93. “Women and Natural Resources: Unlocking the Peacebuilding Potential,” , 22。
94. “Thematic Discussion: Voices from the Climate Front Lines”, 会议笔记(201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首脑会议, 2014年9月23日)。